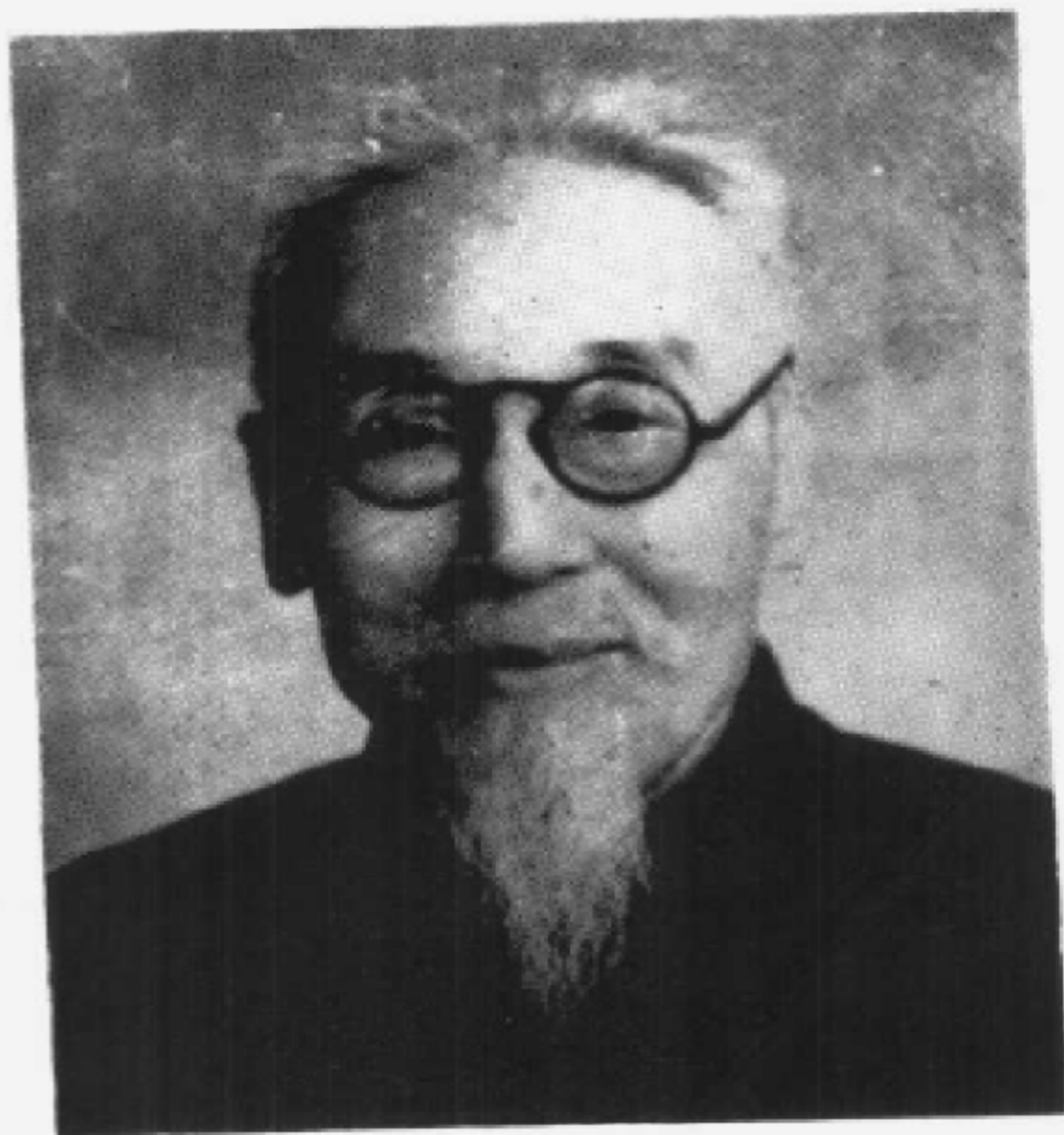


Yt114/21



卢焘烈士戎装照片

市委党史办供稿



张彭年先生八十寿辰照片

张汝弼供稿

目 录

卢森烈士生平.....	秦天真 (1)
黄齐生先生轶事.....	伍静远 (2)
解放前的经历.....	张彭年遗稿 (3)
辛亥反袁志士熊朝霖.....	何静梧 (35)
柴晓莲二三事.....	徐泽庶 (37)
对老主任杨念铭的怀念.....	袁佳 杨家源 (41)
※ ※ ※	
尹笃生先生二三事.....	石国梁 (46)
一代良师李倬元.....	何静梧 (48)
记周杏邨先生.....	贾仁华 (52)
回忆花莱峰教授.....	李嘉谷 (59)
向义小传.....	董君扶 (64)
回忆父亲钱瑗.....	钱安毅 钱安进 钱安慰 (66)
何启智的一生.....	戴素娥 (71)
孙立斋事略.....	杜光炎 (76)
※ ※ ※	
谢六逸事略.....	陈训明 (78)
现代作家谈谢六逸.....	宋洪宪 (83)
邢端先生传略.....	何静梧 (100)
怀念书画家李紫光.....	李协恒 (104)
忆程云深老师.....	张文骏 (106)
孙竹孙先生事略.....	孙家驷 孙家骥 (111)

贵阳籍书画家张寒杉.....董君扶(115)

记评剧老艺人钰灵芝.....汪长锐(118)

※ ※ ※

我怎样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冯程南遗作(124)

张荣熙生平事略.....邓庆棠(134)

记冯介臣.....徐泽庶(142)

孙绥之与味菀园酱园.....王 伦(147)

我所知道的邓棠青.....刘裕远(153)

※ ※ ※

王文华.....李德芳(157)

周西成传略.....程昭星(165)

再谈陈夔龙.....龙之鸿(183)

戴戡事略.....邓庆棠(190)

窦觉苍.....夏骏声(196)

卢焘烈士生平

秦天真

卢焘，原名启焘，号亮畴，壮族。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九伦村（今环江县明伦街），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电令卢焘为贵州黔军总司令兼省长。因耻于参与军阀混战，后辞职闲居贵阳，从事地方建设。贵州解放前夕，为保护地方治安和人民财产，同张彭年、郭润生等组织贵阳治安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绑架杀害于此，时年六十八岁。

（编者按：本文是秦天真同志为卢焘烈士殉难处纪念碑亭石碑撰写的碑文。）

黄齐生先生轶事

伍 静 远

一九四四年秋，我去四川璧山看望黄齐生先生和谢孝思同志。当时，他们二人均执教于正则美术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友人邀我去璧山川剧团，欣赏川剧名演员魏香庭的表演艺术。入团就坐后，挂在舞台前的一幅淡绿色缎子贴黑绒字的横幅（旧社会叫彩）印入眼帘。上面有四个大字“是活教育”，上款是“魏香庭先生惠存”，下款署名“黄齐生”。字是黄齐生先生亲自写的，只是不知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送给魏的。这个横幅，一九四七年魏香庭从四川回到贵阳在庆筑戏院演出时，仍然悬挂在舞台前，一直到解放前夕。

在旧社会戏剧艺人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齐生先生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能冲破世俗的偏见，敢对川剧艺人给予高度评价，令人敬佩。

解放前的经历

张彭年

一九五六年七月

一、学历

我于1886年生于贵阳，三岁而孤。一家七口（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活艰难，合计只有住房五间，花谷十一石左右，每年尚缺三至四个月的口粮。家人挤住三间住屋，腾出两间佃人，余则恃母及大姐十指以资弥补。不得已我于十二岁时往本市熊德义土杂货铺当学徒。旋因长兄协陆考取南书院斋长，年得银十二两、米二石，将我唤回复理学业。到了十五岁，贵州武备学堂聘来之日本教师，儒宫宗亲，请我长兄教授他的中国语言，以收我入他主办的私立师范学校不收学费作为交换。他学中语不送学金，我学日语不缴学费，因此我得学习日文日语和数学一年。翌年长兄中了举人赴京会试，终止了教授中语，我没了学费，日语的学习也就终止了。十六岁时，与黄干夫、贾一民、凌秋鹗等二十余人共组达德书社。数年之间，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地文、地质、生理、卫生、动物、植物、论理诸科，凡高中应备的课程都一一学到。十八岁时考取了秀才。1904年，与达德书社同人创办了达德学校。1905年又与我长兄和友人徐天叙、蔡恒武、陈幼苏等创办了时敏学校。都先从小学办起，我同时任两校教员。1908年被选任时敏学校校长。1909年长兄留日毕业，函命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由罗黔山（贵州安顺人）的介绍，与陈筑山一道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受同盟会

之命回国策动本省响应武汉。及至到了家乡，滇军借北伐之名已占据了贵阳。适值当时的军政府积极恢复原有的各级学校，我遂受任为贵州公立法政学校教务长兼私立宪群法政学校教员。翌年（1913年）元月，通省公立中学堂改组，扩大范围，与私立宪群法政时敏学校合并，改名南明学校。以本校地址办中学（即现在一中地址），时敏（即现在的六洞街小学）改名南明第一分校，宪群（即现在的省府路小学）改名南明第二分校，都专办小学。经三校发起人的联席会议，我被选为南明学校校长。

二、经历上（参加本省政治活动的部份）

1912年，贵州军政府受中央之命，筹备国会、省议会的选举，我被任为贵州全省国省两会选举事务所所长。1913年选举事竣，我被选为贵州省议会议长。1914年春，叶香石来到贵州，都督唐继尧、参谋长黄毓成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即与叶交厚，唐遂任命叶为滇军第一师师长，黄为旅长。其实滇军实力只一混成团，增加了一个师部、一个旅部的开支，财政方面每月须增七万多元的支出，加上临时费，每年预算须多支出约一百万。贵州全省财政，清末每年约六十余万两，折合银元不过一百万元，加上反正初期一切未上轨道，自1911年至1913年期中亏空约三百万元。至1913年下半年，力加整顿，丝毫未增加人民负担，只剔除衙门陋规和官吏中饱收入即增长了一倍，每年收入约二百一十多万元。以之应付军政各项开支，非精打细算不易得到平衡。兹突然增加了将近二分之一的支出，贵州财政即濒绝境，若任军人肆意收括则黔民便无日子可过了。不得已由省议会和与滇都督蔡锷有

私交的人，联名密电蔡呼吁，详述贵州财政危机及因此可能招致的恶果。蔡初次复电亦无善法，继则电询黔人：若果自量有维持地方的力量，蔡自愿将云南都督职位让给唐继尧，命唐率全部滇军回滇，以解黔民之困。彼时我们因此为难了一个时期，若向蔡客气不赞成他的主张，委实舍此而外想不出其他较善办法；要是表示赞同，就无异请蔡让位给唐，人情上实觉得口。踟蹰许久，迄无办法，大家决议，只好厚着面皮委婉地回电赞同，并经过些周折，才将滇军送离黔境。

滇军驻黔，明明和黔民的生活是一极大矛盾，竟有三数友人坚持异议，并暗地游说唐继尧不要放弃贵州，主张留一部份滇军由叶、黄率领仍驻黔境，其说唐的理由是：“拿一省不如拿两省好”。唐素好大喜功，大为所动，对于蔡愕电请北政府在滇军行后关于贵州善后的部署密不发表，力筹兼辖贵州的办法。我见情势日迫，特召集秘密会议，用省议会名义径电北政府追问。一面大发请帖，由省议会代表人民向全滇军各级将领饯行。唐不得已快快而去，大家都觉是不欢而散。

1915年筹安会出现于北京，袁世凯背叛民国改元洪宪，蔡愕、戴戡由京密电滇黔准备讨袁。电到后刘显世约集同志十二人（刘显世、刘显治、熊范舆、何麟书、陈智芬、熊其勋、李映雪、王文华、吴绪华、蔡衡武、张协陆、张彭年）密议于护军使署（彼时袁世凯的耳目龙建章正任贵州巡按使），贵州全省军队，仅步兵六团和警卫一营。当即决定蔡抵滇后一宣布独立，贵州立即响应，将六团步兵分为两路，以前贵州巡按使戴戡为北路总司令，率熊其勋一旅共步兵三团出川；王文华为东路司令，率其余三团出湘，所余一警卫营维持后方秩序。彼时最可虑的是广西态度尚未分明，龙觐光

攻滇粵军已大部入桂，广西倘若附袁，我后方策源地仅一营兵力，实难应付。此着关系讨袁全局的安危，理应预为之备。经众决议，命我驰赴兴义县招兵三营，赶速训练，防范广西。我于1915年十月兼程到达兴义，向盘江八县招兵，而人民知道是反对帝制，报名极为踊跃。编制结果，挑选得精壮战士回营。是时滇黔已宣布独立，黔军已分出川湘，迭得胜利。得到显世电告：黔军出湘已收复二十余县，王司令文华迭电请求派我迅赴湘西，办理善后巩固后防，望我将所编部队交由贵西道尹刘显潜接管，迅即来省等语。我遂又兼程赶回贵阳。到省后，都督府迭开会议，金谓贵阳为滇黔策源地，特别黔军责任及事务均极繁重，人力稍有不周，贻误全局匪浅，不如留我在贵阳协助，因止湘西之行，留任都督府参赞。

1916年四月，广西宣布独立，解决了龙觐光攻滇部队，讨袁军局势较前稳固。袁世凯见火已燎原，无力收拾（冯、段坚决反对袁克定军队调动不灵），取消帝制，因急成病，不久遂毙。黎元洪继任总统，明令恢复各级议会，并任命我为贵西道道尹，因省议会议员们的恳切挽留，遂辞新职，仍长议席。

黔自反对帝制，军队已增加成十个团，还有游击军二千多人（即我赴兴义招募的那一批军队），本省无力给养，都是向川湘发展。1916年至1926年十年期中，黔军常驻重庆、洪江或川黔接壤的西秀黔彭四县，目的都在就地给养。因黔军尚有一部驻川，1917年段祺瑞命吴光新率兵五旅侵入四川，熊克武连战失利，迭电向黔请援。黔命袁祖铭率兵两团，由西秀进攻重庆，经二十二昼夜的血战，竟将吴全部逐出川境。捷报到达贵阳，我见伤亡人数竟达一千三百七十几名，两团人已损失了大半，大为激动。我想我们的军队，要是能

够自养，不靠替人打仗换饭吃，何致年年都在损失我省宝贵的青年，并还背着侵略者的恶名。我认为我们每年丧失的地方子弟死得太冤，我是地方人选举出来的，议员们又挽留我不许另任其他职务，每年都听任冤冤枉枉地死了些青年，我应该有责任并还不轻，我应该快地想补救办法。我陆续地向诸友提出这一问题，都以一时没有办法无人附议。不得已，只好打个人力之所及做一点算一点的主意。先从调查本省的生产量入手，将全省出产摸清了底，再设法加以整顿。省议会有五十二个议员，我印制调查表分散给他们，请每年会毕回乡的时期担负调查他们本县出产的责任。一面咨请政府，请拨出专款选送学矿的学生。政府依议考选了八名。我嫌太少，又于私立南明学校内撙节开支，精打细算，于开支外每年节省出数千元，俟凑集成数，购置工料器械，开办高级工科，替送出留学的学生准备干部。凑集到1919年，已存集大洋五万数千元，方期凑到十万即汇去购买第一批器械。而至冬季，我离了贵阳，王文华荐窦居敬继任校长，不到一年即将所储之款耗尽。事后清问，窦打牌输了都是由此款支取，无怪其然了。1953年曾向陈曾固副主席谈及此事，承陈指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根本就不会彻底做成一樁比较长期底事情的。我1919年所以离开贵阳，是由于王文华用武力驱逐他的舅父，地方因之惹起大变乱。

王乃刘显世外甥兼姪婿，一岁而孤，与兄伯群依刘氏长成，衣食教育都是刘一手照顾，以一师范生而大队长而警察厅长而师长而总司令，都是刘一手扶持。王使用多面派手法，表面上极端恭顺，刘亦认为亲信可托，军队的用人和编制，都任其一手处理。积之既久，羽翼已成，遂处心积虑取刘而代。这种情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又值军阀割据，

竞争剧烈，人欲横流的巨浪里，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而事变的导火线，乃起于铁路附带的借款，这是加重全省人民的负担，徒饱少数人私囊的问题，与刘王两氏的消长、个人的得失不能相提并论的。先是王文华之兄伯群，由上海寄来外商承筑柳渝铁路的草约，其中要点是路由外商集资修筑，路的两旁各三十里以内的矿产由承筑人全权开采。省公署召集会议，与会者对筑路问题无甚异议，惟筑路草约之外贵州还附带向承筑人借有美金一千万元，年利六厘。众人问王文华：凡借款必须先將用途计划好，款一到手就投到生产上，资金方不致浪费，利息也才有来源。你们既想替本省借这一笔款，要抵全省十年的总收入，究竟是如何打算，请说给大家听听，我们方好讨论。王答：事前并未打算如何用法，就是请你们来商量决定。于是有主张修筑铜仁、镇远到贵阳的马路的，有主张发展铜仁水银的，有主张开河道的，其说不一，终得不到统一的意见。及至谈到每年六十万美金的年息由何支付，大家都无办法。王文华则主张拉本盖利。接着王又说黔军在川，川省协助的款每月都不够用，因此对于士兵欠饷甚多。以往士兵知道本省很穷，饷虽未清尚维持得住。现在我们既借得这笔款子，倘不将欠饷补清，我就维持不住了。所以款到手后，请拨一百六十万美金交我，我方敢继续负军队的责任。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缄默至十数分钟之久，大家都僵住了。刘显世见情势如此，向众宣告缓日再议。

翌日拂晓，政务厅长陈幼苏即来寻我长兄研究，并命人约我参加。陈说昨日会议的情况，大家都看得明白，何尝是为地方福利而筑路，不过借筑路好附带借入这一笔巨款以饱私囊罢了。款到手后，一索就是一百六十万，此端一开，今

年索一笔，明年索一笔，贵州人冤冤枉枉地背上一笔大帐，好了他们少数人肥家入己。我考虑这樁事情，与外商订约，省长得出名，主管的财政厅长得出名，代表民意的省议会议长得出名，你们出名的人虽然在回扣中每人可分得一二十万的好处（在王伯群致刘显世的私函中说，此款照例可得六十万美金的回扣，凡列名约中及经手人都可分润），但绝大多数都入了军人的荷包，老百姓除负担外无丝毫好处，你们出名借款的人责任真不小。他们想得真巧，自己用钱别人出名顶缸，顶缸的人子孙也抬不起头，用钱的反逍遥。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设法打消这笔借款，免地方无故受此损害。我长兄协陆说：我昨夜归来想起电轮（即文华）的发言，与前月他由重庆归来我们到普照寺去接他，他当着众人向我说的一番话是完全矛盾的。或者你还记得，他说见我数年来在财政上支撑很苦，本想在四川协饷项下多少有所挹注，替贵州财政松一口气，替我帮一点忙，殊川省协款仅仅敷用，没有长余，因此无力来帮助我，很对不起。他前月还说敷用，欠饷这一名词数年从未听过，此刻借款有了希望，忽然提出欠饷，借款的目的可想而知。并且一索就是美金一百六十万，折合华洋三百二十九万元（彼时市价）。我想我们担任地方的职务，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的学识能力不够，只要我们没有怠忽了职务，兢兢业业地竭尽所能为地方打算，事情虽没有办好，或许还可以得到人家的原谅。要是当着地方大利大害的问题，明明看着全省人吃亏，徒饱极少数人的私囊，我们因畏惧军人的权威唯唯诺诺，不敢凭良心办事，连应该说的话都取巧不敢说，我们平日都在砥礪做人，那直是自欺欺人了。因此决定铁路赞成修筑，惟对于筑路之外向承筑人附带另借之美金一千万元，先由我长兄另提办法，王若再固

执己见，再由我向议员们阐明其中的利害，不予通过，总期杜绝款落私囊，民间得到实益。

我长兄协陆所提的办法，铅印成幅，分散贵阳各界及铺户居民，希望人民提供意见（至今在关心地方的人士中或尚有存在）。其中要点：（1）是说此项借款，事前既没有商定用途，而款一到手即须取息，每年利息美金六十万，折合华洋一百二十万元，并非小数，稍一耽延，坐耗资金，反而贻累人民；（2）拉本作利息不是办法，须顾虑到还本时期到来，还不了这笔债，我们何颜见全省同胞；（3）既是一时还想不着适当的用途，款一时不必借这样多，徒损利息。主张只借华洋二百万元，利息每年十二万元，由财政厅负责筹解，以免拉本利息；（4）此款无论财政如何困窘，都绝对不许拉用一文，并主张军政各机关的首长都须署名盖章，公告全省，请全省人民注意此款点点滴滴都须用在贫民身上，任何机关、任何事件都不许拉用。此印件分散后，街头巷议都说这才是替贵州人的踏实打算，拉本作利是败家子的办法。因此触怒了王氏，认为扫了他的面子，并阻了他的财路。在他自办的《少年贵州报》上歪曲宣传，说我们脑筋旧，反对修铁路，对借款只字不提。一面组织暗杀团，想藉此将认为于他的行动有碍的人一举剪除，一劳永逸。一面以库存旧军服五千多套，命何应钦、谷正伦、孙剑峰的军队沿街散给贫民，派军人变装率领，订期捣毁家兄及王之业师熊范舆住宅（因熊是刘显世亲家，时任督军公署兼省长公署秘书长及贵州中国银行行长）。一时风声鹤唳，市面极为惊扰。不久陈幼苏被刺，身中两枪幸未致命。王文华又将军队改装冒充贫民，凡稍存疑忌的人都想乘此剪除，免此后再生问题。而其秘密组织中人不乏公正之士，在何应钦住宅密议决

定后，即有数人向有关方面秘密通知，家兄认为职务所关，为地方利害挺身奋斗，自己任何牺牲在所不计，不过因此而累及多人，殊属不值，不如自我发之，自我收之，地方元气不致大损。一面函告诸友，嘱此后须善维地方；一面即从容服毒自杀。王以家兄死后地方人颇持公论，野心稍戢，一时不便波及多人。适至翌年（1920年），令其所部由川回黔，指使何应钦、谷正伦等逐去刘显世，杀其业师熊范舆、老绅耆郭子华，搜杀黔中道尹何麟书、省署秘书丁宜中不果，迁怒凶杀了何麟书的侄子及其七岁和三岁的幼孩。谷正伦还出示通衢说，这些人都有该杀之罪。1919年何应钦住宅的密谋，至1920年完全实现。军阀割据时代各省的变乱，未有如贵州这样凶残的。

王文华指使谷正伦率部与何应钦合力倒刘，因忌黔军第二师长袁祖铭的战功及军事潜力，恐袁随军归来发生障碍，自己表面上要避去以甥逐舅恶迹，迫袁随其同赴上海。一面与谷正伦约定，逐刘后电迎王回黔主持；一面密令从行监视袁的行动。我于家兄与王决裂后避往上海，袁抵沪后秘密找我晤面，详告王的密谋。费了若干安排，袁始得脱离了王的监视微服北上。先是袁在军中多立战功，王系以亲见用，且素非军人，实际多不及袁，每逢战事激烈，诸将束手则激袁出马，事一平定即调闲职，已激起军队内部的不满。此次回军倒刘，凡随袁立有战功的人多调闲职，更激起部下满腔的愤怒。王袁到沪后，闲职军官陆续随来，谈到不平，都有含血喷天，拔剑斫地，誓欲得王甘心之慨。我与师长何璧解，每次都从旁加以鼓励。1921年元月，北政府嘱袁电约我赴京磋商黔事。延至四月，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为黔籍军人所杀。彼时我同袁祖铭正由北政府派到武昌与王占元商谈定黔事宜，已

成立定黔军总指挥部于武昌，在汉口得阅报纸，与袁追述前事，深以未得亲刃此仇为恨。

王文华死后，黔内部五旅争权，时生变乱。我们既在武昌成立了司令部，王占元拨张允明旅随我们新成立的警卫两团入定黔乱，因川湘都不允假道，事暂停顿。及至1921年冬，黔军驻扎洪江的王司令华裔迭电欢迎，请我们指挥他的所部入定黔乱，同时袁祖铭旧部亦派代表迎袁。我们遂轻车简从，取道洪江回黔，沿途军民纷纷响应，并未发生一次战争，于1922年三月入驻贵阳。北政府命田德三（步兵统领衙门统带、我们的驻京办事处长）来电，欲任命我为贵州省长、袁祖铭为黔军总司令，征求我们的同意。我急电田说，现正急于安葬先兄，葬事完竣即须离黔，亟力荐袁。一面与袁相商，自愿任省政府参赞，盖鉴于本省和各省的往事，军权时代不烛照机先，决没有好果的。

自反对洪宪之役起，黔军作战多年，军械窳败，不堪防御大敌。我们到贵阳后，即向汉阳厂订购步枪五千和机枪弹药，派警卫混成团长许开凤、统带何璧辉率领精兵数千，赴鄂解运。而唐继尧企图恢复滇川黔联帅名义，来电要求贵州附名拥戴。我们以大局客观形势已非前十年之比，婉辞劝之。唐认为贵州不似往昔柔顺，遂乘我精锐运出运械未归之隙，欲以武力迫我听命，假送刘显世还乡为名，第二次侵略贵州。我等欲待与之硬拼，而得力的官兵多已派往汉阳运械，徒受损失无补全局，遂与地方父老约定，我军政人员全部离黔，俟与运械精锐会合，即回救乡难。临行时，我去函责备唐继尧说，你素来常说想联合同志替国家尽一点力，现在对于素有历史关系的贵州都肆行侵略，遑言他省；对于素有交谊的贵州朋友都不能善处，遑言他人。因此他迭电请我

不必离黔，并托我代留黔军诸友不必出境，双方从长计议。我将来电送诸友阅后，仍照原计划进行，对来电置之不理。军行至龙潭，川省杨森派旅长白驹来谒说，川省一、二军正在作战，二军虽由吴佩孚派有两个师三个团相助，军力仍感不够，故未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请求黔军入川代守重庆，以便腾出防守川东兵力加入前线，俾得早定川局。我们婉辞，将与本省父老有约，一与运械之兵会合即须回救乡难的情况告之。不数日杨又派其参谋长李御良兼程赶来，恳切邀请，并言（1）黔军驻渝一切给养都由杨负责；（2）黔军由鄂而赴汉阳，路小难行，十分辛苦，杨有轮船两艘，黔军到渝后，杨负责将在鄂的官兵械弹运渝，较为便捷。我们为其所动，遂决计赴渝。

到渝月余，杨及鄂军节节失利，第一军已逼近老关口，渝防吃紧。杨由前方派人游说黔军，谓敌人势盛，渝城恐难固守，一旦有失，黔军非主非客，必感不便，不如此刻即请派兵援助，将敌人打退，则主客都便云云。不得已派王天培、彭汉章两师，由铜梁、大足横击，将敌人逐过内江彼岸。自此以后，黔军参加必得胜利，黔军不动必遭损失。北政府得报，遂加袁祖铭为援川前敌各军总司令，我为总参赞。川战未决，就无暇顾及黔事了。

黔军在川，实力日厚，唐继尧欲久据黔省，企图利用川省与我相反的兵力，在境外将我消灭以除后患，特派胡若愚率领大部滇军赴川助第一军作战。殊垫江一役，被我将其主力击溃，追奔逐北，仅得残余逃回滇省。唐太为震慑，来电告我说：尧决心无条件交还贵州，欲派一人与兄等商议，一时想不出对两方都可随便说话的人，兄意中若有适当之人祈电告。我与诸友商议，提出卢焘。卢到渝后，一切都得顺利地